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材料

(二)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四月

# 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主义》一书概要

馬 克 思

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主义。緒言。第一部。1873”<sup>①</sup>。

（这个标题后面第一頁上：“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斗争”）。

## 序

“和在俄国一样，在意大利这样的青年人相当多，比别的国家多得多。”（第7頁）

“是的，可能意大利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接近社会革命。”（第8頁）

“在意大利，貧苦的无产階級占着优势。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追随他們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无产階級表示极度的輕視，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未来社会革命的整个智慧和全部力量都表现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的工人群众中的资产階級阶层身上。”

① 将引文由德文譯回俄文时，保留了巴枯宁的原文（依照1873年版）的面貌，同时仅保存了馬克思在翻譯中所作的修改。引文中的特号字表示馬克思直接用俄文作的摘引（旧体字和馬克思的笔誤不再印出）。引文中的全部着重点（除了特別說明的以外）都是馬克思加的。粗体字（黑体字）表示馬克思作的評語，手稿中原用方括号表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 用特号字（宋体字、楷体字）表示某字某句系馬克思直接用俄文作的摘引，并无原則性的必要，仍用普体字排印。——譯者注

德国人則相反：政府一方面依据訓練有素的軍隊等，另一方面依据“忠心耿耿的爱国主义、无限的民族虚荣心以及古已有之的对政权同样无限的俯首听命和奉为神明的虔诚，这些至今是德国贵族、德国市民(bourgeoisie)、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以及可惜在他們共同影响下往往德国人民本身的特点”（第11頁）。

“看来，普魯士吞食了德国。这就是說，当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时，无论采用怎样虚伪的自由主义的、立宪的、民主的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普魯士都必然是欧洲的首席代表和种种专制的經常的来源。”（第11頁）

从十六世紀中叶起至1815年止，一切反动运动的来源是奥地利（即德国的代表）；从1815年至1848年，奥地利与普魯士分庭抗礼，而奥地利占优势（梅特涅）（第12頁）；“从1815年起，我們的鞑靼、日耳曼、大俄罗斯帝国暴政参加了这个純粹德国反动的神聖同盟，它不是充当生意人，而是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以热心者的身份出現。”（第13頁）

德国人为了推卸責任，企图使自己和別人相信，神聖同盟的罪魁禍首是俄国（巴枯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綱領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大德意志国家。和他們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首先完全摧毁我們的（俄国的）国家”等等（第13頁）。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希望为彼得堡內閣的政策作辯护”（第13頁），巴枯宁給了德国人如下的答复（且不說从彼得一世以来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普魯士，伟大人物甚至也不提到叶卡特林娜当朝时的同盟和从革命时起至路易·菲立浦时俄国对法国的影响。）（关于从十八世紀起俄国和英国一同为了奴役欧洲而进行的欺騙，也是同样不提）。他从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开始，对他們的活动作了如下說明：“亚历山大从始至終都在奔波忙碌，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額，严峻逼人。但是如此也

就了此一生。他們一事無成……因為他們無能為力，因為他們的  
朋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國人不許他們行動；他們只能起着稻草人  
(hange machen) 的光榮作用，真正行動的只有奧地利、普魯士和  
在它們領導下及得到它們允許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國波旁王朝。”（第  
13、14頁）

俄國只有一次、即在1849年越出了國境，去拯救奧地利擺脫匈  
牙利革命的危險。此外，在十九世紀期間，俄國曾在普魯士的幫助  
下兩次扼殺了波蘭革命。普魯士也和俄國一樣熱衷于此。當然，“沒  
有波蘭的獨立和自由，人民的俄國是難以想象的。”（第14頁）

俄國“無論在思想、實力或財富方面都沒有在歐洲占着優勢，  
不能一意孤行。”

只有當某個西方大國召喚時，俄國才能有所作為（例如，弗里  
德里希第二建議叶卡特林娜瓜分波蘭甚至於瑞典）。

“在對待歐洲革命運動的態度方面，俄國在普魯士國務人士手  
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往往還起着屏幬的作用，這些人士借此很巧  
妙地掩蓋自己的反動侵略勾當。”在不久以前獲得勝利後，他們對  
此不再需要，因而不再如此（第15頁）。

如今，俾斯麥和柏林是歐洲反動勢力的顯要首腦和官邸（第16  
頁）。在羅馬（羅馬天主教會）、凡爾賽，其次在維也納和布魯塞爾，  
是反動勢力；在俄國，是反動暴政；但是活躍的、狡猾而真正強大的  
勢力集中在柏林，並從新日耳曼帝國歐洲各國擴展等等（第16頁）。

“工人協會、小組、公社、鄉、省和各國人民自下而上的聯合  
組織，是真正自由、而不是虛假自由的唯一條件，這種聯合組織和  
它們的本質相抵觸，正如任何的經濟自治和它們是不相容的一樣。”  
（第17頁）

相反地，“代表民主制為了成功，需要兩個條件：國家集中，

臣民真正服从似乎代表他們而其实是不断剝削他們的少数进行管理的劳心者。”(第17頁)

“我們的韃靼、日耳曼帝國的實質。”(第14頁)

新日耳曼帝國勞兵驕武，它要征服別國或者被征服(第17—18頁)；“不可抑止地企圖成為全球之國”(第18頁)。領導權只是這種意圖的委婉之詞；這種意圖的條件，是盡量削弱周圍一切國家或者使其服從。最後的法蘭西帝國曾起過這種作用，德意志帝國現在起着這種作用，“我們確信，德意志國家是歐洲唯一真正的國家”(第19頁)。

(國家[Empire, Royaume<sup>①</sup>]; 國君[Souverain, monarque, empereur, roi<sup>②</sup>]; 管理國家[regner, dominer<sup>③</sup>]; 國君[Souverain, empereur, monarque, roi<sup>④</sup>])。(相反地，德德的萊希[Reich, 國家]最初是指大小不等一定範圍內的地區，它根據所屬族別和居民的名稱命名。例如，上普法爾茨的列根附近至費希塔赫的地方是：維希特萊希；阿赫納萊希；弗蘭克里克〔尼德蘭境內〕；寧威根萊希；麥根萊希；摩塞耳的特拉布赫區至今還稱格勒維萊希，摩塞耳的另一個地區稱威斯特里希)。

法蘭西的國家事業結束了；誰稍微懂得法國人的性格，就會和我們（巴枯寧）一樣懂得，如果法國過去長時期能夠成為首屈一指的國家，那它決不可能屈居次要的、即使是和別國相等的地位。法國將準備新的戰爭，報仇雪恥，恢復失去的首席地位(ersten range)(第19頁)。但它是否能夠如願以償呢？絕對不能。近來的事件證明，

① 帝國，王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② 元首，君主，皇帝，國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③ 主宰，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④ 元首，皇帝，君主，國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的国家美德在法国已不复存在(第19頁)。上层阶级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虚荣,如最近一次战争証明的,他們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牺牲它。法国农业居民的爱国主义也同样微不足道。当农民成为私有者以后,他就不再成其为爱国者了。法国的爱国主义只在亚尔萨斯与洛林表现出来,这是对德国人的嘲笑。只有城市无产阶级保存了爱国主义。因此有产阶级的仇恨主要向无产阶级身上发泄。但他們并不是本义的爱国者,因为他們以社会主义精神待人(以兄弟精神对待其他所有国家的工人),武装起来不是反对德国人民,而是反对德国軍事暴政(第20—22頁)。第一次日内瓦大会以后只过了六年便开始了战争①,但是国际的宣传“特別”在“拉丁族”工人中間激发了新的反爱国主义的世界观(第22頁)。在1868年維也納群众大会上也表現了新的反爱国主义的世界观,以回答青年德意志的平民民主派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的与爱国主义的“建議”。

“工人們回答他們說,他們长期剝削、欺騙和压迫工人,全世界的工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国际工人陣营是工人唯一的祖国;世界上的剝削者是工人的唯一的敌人。”(第22、23頁)当时“給巴黎的兄弟們、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先鋒”拍了电报,以为証明(第23頁)。这个答复在德国引起了一片吵嚷之声;吓坏了所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包括約翰·雅可布,并且“不仅侮辱了他們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侮辱了拉薩尔和馬克思学派对国家的信仰。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脑之一,而当时曾是平民民主党(已經不存在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內西先生,大概是遵照馬克思的意見,立即从萊比錫赴維也納,

① 笔誤;巴枯宁的原文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初成立之后过了六年,第一次日内瓦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去和由于‘政治上欠妥当’而給这次爭吵造成口实的維也納工人进行談判。應該給他說句公道話，他的活动相当順利，結果几个月之后，即在1868年8月德国工人紐倫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所有代表都毫无異議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狹隘爱国主义的綱領上簽了字”（第23、24頁）。这說明，“这个党的多少有点学者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領導人的政治方向，和德国无产阶级、至少是奥地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之間，有着深刻的差別”。然而从1868年以来，这种本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少有发展，而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特别是在法国，則大为发展（第24頁）。法国工人意識到，他們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是为了全世界工作（第25頁），“而且为世界的成份比为自己的成份更多”（第25頁）。“这种幻想已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从它的内心深处排除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

（第26頁）法国无产阶级号召拿起武器时确信，它“不仅为了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而斗争，同样也是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自由与权利而斗争”（第16頁）。他們不是追求丰功伟績，而是力求战胜为资产阶级奴役他們充当工具的令人痛恨的軍事力量。“他們所以痛恨德国军队，并非因为这是德国人，而是因为这是军队。”（第26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国民會議和反对祖国救星梯也尔的起义……充分表露了如今唯一推动法国无产阶级的热情。在法国无产阶级等看来，只有社会革命的战争（第27頁）。在社会革命的高昂热情中，他們宣布彻底摧毁法兰西国家，剷除与法兰西各公社自治不相容的国家的国家統一。德国人仅仅縮小了他們政治祖国的国界和力量，〔而他們〕想要完全致它于死命（umbringen, erschlagenn），而且似乎是为了暴露这个叛国的目的，他們推倒了樊多姆广场的紀念柱、这个法国光荣的雄伟紀念品。”（第27頁）

“总之，一方而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第29頁）在

法国，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在农民中间，至少在法国南部已经如此（第30頁）。“两个从今不調和的世界的敌对局面，是使法国不能成为重居首位、占着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第30頁）当梯也尔宣布普魯士军队撤退时，凡尔赛交易所、资产阶级等竟慌作一团（第31頁）。“可见，法国资产阶级的奇怪的爱国主义是从祖国可耻的屈辱中求救。”（第31頁）“法国尤其是法国南部的工人如今对西班牙革命表示极其明确的同情，这里的无产阶级明显地表示愿意和西班牙无产阶级实行兄弟般的联合，甚至和他們組成建立在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人民联邦（人民——Volk, Nation [natio, nasci①]，原指某种生成的东西、产生），打破一切国家的差别和界限。我说，这些同情和愿望证明，对于法国无产阶级，和对于特权阶级一样，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第32頁）

“这样一个老旧的、无可救药的国家（如法国）怎么敌得过年青的、至今还健壮的德国？”（第33頁）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也不能够给予人民所必需的东西，“即不受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护、暴力，维护本身利益的自由的（自由的，亦即不受拘束的）组织（自下而上），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共和国、最民主的国家，即使是马克思先生想象出来的所谓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少数似乎比人民本身更了解人民真正利益的特权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第34、35頁）。总之，由于有产阶级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和人民的要求，他們便“只有一种法宝——国家暴力，一言以蔽之，即国家，因为国家也正是暴力（violence, vehemence, force②），是利用暴力进行统治，这

① 拉，产生（拉丁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② 暴力，压力，强力（法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种暴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則加以掩飾，在极端的情况下則露骨地进行”等等（第35頁）。甘必大在这里也束手无策；（法国）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激烈斗争“要求采用政府（国家）的全部資金和力量，結果法兰西国家沒有任何資金和力量来維持自己在欧洲各国間的对外优势。它哪里竞争得过俾斯麦帝国！”（第37頁）法国被迫屈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领导、友好保护的影响，就如同意大利国家过去服从法国的政策一样（第37、38頁）。

英国：影响驟然縮小。下面的話值得注意：“三十年前，它的影响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听任德国人占領萊茵省、俄国恢复在黑海的优势、俄国人出征基发”（第39頁）。这种让步等等的原因在于工人世界向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階級剝削世界作斗争（第39頁）。那里社会革命正在逼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它們没有什么值得一談：它們决不会成为咄咄逼人的强国，不是因为缺乏物質手段，而是因为人民的精神把它們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第39頁）。順便說說：西班牙在人民反拿破侖战争期間重新觉醒了，而拿破侖本人也出身于粗野群众。1812与1813年間，德国的情况則截然不同：直到拿破侖在俄国失利后，德国人才为之一动。只有提罗尔是例外（第40、41頁）。在这里：“我們看見，充裕的財富能腐化法国的农民，扑灭他心中最后的爱国主义火星。”（第42頁）在德国（1812—1813），青年公民們，或者确切些說，被哲学家和詩人們鼓动起来的忠臣們，都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关于大德意志国家的思想正是这时在德国出現。西班牙人民則全体奋起，再次抵抗残酷而强大的奴役者，捍卫祖国的自由与人民生活的独立（第43頁）。以后，西班牙徒然地試过了各种形式的政府——专制的、立宪的、保守的和共和的政府等等；甚至类似瑞士联邦的小资产階級联邦共和国的形式（第43頁）。

頁)。“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严重地影响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和厄斯特勒馬都拉省的农民不問三七二十一，不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夺取以前地主的土地。加塔隆尼亚省、尤其是巴塞罗那城响亮地宣布了自己的独立自治。馬德里的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让革命服从立宪會議以后的指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掌握的北方，也在发生显然的社会革命：公布各种法典，宣布各省市独立，烧毁一切法庭的与民事的文据；軍队在西班牙全国与人民联欢，赶走軍官。社会与私人的总破产开始了，这是社会經濟革命的第一个条件。”

(第44頁)“財政、軍隊、法庭、警察不复存在；沒有国家势力，沒有国家；只有强大的、新生的人民，它如今激动着一股社会革命的热情。在‘国际’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团结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等等(第44頁)。意大利人民中間只有省(Provinz, kreis, District)市絕對自治的传统。除了这个在人民中間存在的唯一的政治概念以外，还有历史上人文学方面的种种省区，人們讲的方言相差很远，甚至于一个省区(en passant [順便說說])，这也是权力、力量)內的人都难于互通語言，有时則根本不懂别的省区的人所讲的話；但意大利社会并不是分散的。相反地，意大利人有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族、甚至南方人的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第45頁)。“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結果必然出現自由的社会組合。”(第46頁)这一切都只是說人民群众。相反地，在意大利資產階級上层阶层中，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剝削人民劳动的特权階級的社会統一也已形成和愈益发展。这个階級如今在意大利通称为同伙……——整个官方集团，即官僚与軍事、警察与法庭的集团；大地主、工业家、商人与銀行家；整个官方与半官方律师界及文学界、整个議會(第46頁)。

然而甚至民不聊生的貧困，甚至挫折百万大軍无产階級的貧困，

也不足以保證革命……當人們陷入絕望的境地，他們的憤慨已經達到極限……甚至德國人在絕望中也會失去理智，但要使他陷入絕望的境地，却要有很多的刺激……但是貧困和絕望只能產生局部的、大都是地方性的風潮，而不足以席卷整個人民群眾。為此必須有一個全民的理想，它總是在歷史上從人民本能深處產生的……此處還有對自己權利的信心，可以說，這是對自己權利的宗教信仰（這和貧困與絕望一起就是社會革命的良方）（第47、48頁）。“意大利人民正是處在這種狀況。”（第48頁）加之，“國際”（即同盟①）特別在最近兩年（1872年和1873年）積極在意大利活動，充當這種理想的催生婆。“它〔國際的宣傳〕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應當實現的目的，同時並說明了組織人民力量的途徑和手段。”（第48頁）“妙不可言的是，和在西班牙一樣，在意大利馬克思的國家共產主義的綱領簡直沒有走運，相反地，那里廣泛而熱烈地接受了全世界有名的（臭名昭彰的）社會民主同盟或社會革命黨人同盟向一切統治、政府監護、領導和權威無情宣戰的綱領（第49頁）。在這種條件下，人民能夠求得解放，在所有人和每個人最廣泛的自由意志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生活，但絲毫不危及其他人民的自由。”（第49頁）

總之，由於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認同盟的綱領，所以它們接近社會革命，從它們方面不會有任何征伐政策的危險（第49頁）。

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等小國“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可見，正是因為他們接受了同盟的綱領！），“但主要是由於自己‘在政治上無足輕重’（第49頁），它們不威脅任何人，相反地，大有理由擔心新日耳曼帝國的征伐”（第50頁）。

奧地利無可救藥。它分裂為兩個國家：馬扎爾—斯拉夫國家與

---

① 指巴枯寧組織的“社會民主同盟”。——譯者注

日耳曼 - 斯拉夫国家 (第50頁)。在后一个国家中, 德国人想进行統治。“可以說, 日耳曼人、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生性依靠爭夺历史权利, 即一方面爭夺征伐和老資格的权利, 另方面爭夺空头的文化优势。” (第52頁) 近年来德国人被迫承认馬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在奥地利帝国居住的各族中, 馬扎尔人是仅次于日耳曼人的最能組成国家的人民;” (第52頁) 他們声明有統治和他們一同居住匈牙利王国境内其他各族的历史权利, 虽然他們自己只占居民的三分之一强 (即馬扎尔人五百五十万人, 斯拉夫人五百万人, 羅馬尼亚人二百七十万人, 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一百八十万人, 其他各族約五十万人, 共計一千五百五十万人) (同上)。于是, 奥匈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 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的齐斯萊塔尼亚部分, 人口二千零五十万人 (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七百二十万人, 斯拉夫人一千一百五十万人, 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約一百八十万人); 馬扎尔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亚人、日耳曼人的部分 (第53頁)。

在匈牙利, “服从馬扎尔人的大多数居民对他們沒有好感, 事与愿违地受他們的压制, 因此就有經常不断的斗争” (第53頁)。馬扎尔人害怕羅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起义, 因此就和俾斯麥秘密联盟, 他“預見到反对注定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必不可免, 便向馬扎尔人討好” (第54頁)。

在齐斯萊塔尼亚帝国, 事情并不更妙。那里的日耳曼人想統治斯拉夫人多数。“日耳曼人憎恨斯拉夫人, 就和老爷們总是憎恨自己的奴仆一样” (第54頁), 害怕他們解放等等。“和一切占領异国領土、征服他国人民的民族一样, 日耳曼人完全不公正地憎恨和鄙視斯拉夫人。” (同上) 普魯士的日耳曼人主要指責奥地利政府不能使斯拉夫人日耳曼化。“他們相信, 这是反对全德爱国主义利益、反对大日耳曼主义的莫大罪过,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第55頁) (着重号是巴

枯宁原有的)为了和这个大日耳曼主义相抗衡,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了波兰人以外,提出了大斯拉夫主义这种同样“讨厌的荒唐話、反对自由和危害人民的理想”(第55頁)。(巴枯宁先生在注释中威胁要仔細研究这个問題,正是指的这一段話;他在这里只号召俄国革命青年反对:他承认,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間,有俄国奸細这样活动,說沙皇愿意把他們的国家从德国束縛下解放出来,“同时,彼得堡內閣公然向俾斯麦出卖和背叛包括摩拉維亞在內的整个波希米亞,以求他答应在东方給予援助”。)

在奥地利人、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有教养的人士及其他人等的整个阶級期待俄国人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罗斯沙皇大国下面建立大斯拉夫王国①”(第57頁)。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仅仅說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恶的德国文明已經在何等程度上深入到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中……他們完全成了德国人,虽然他們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們想通过德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桎梏下解放出来。因为受到的是德国的教育,他們只知道成立各个斯拉夫国家或統一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求解放。因此他們給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日耳曼帝国或大俄罗斯帝国的最新式中央集权、官僚、警察、军队的国家乃是純粹的德国貨;在俄国,它以前混有韃靼的因素,但由于韃靼人的效劳,現在德国倒无事可干了”(第57頁)。

“在本质<sub>上</sub>,斯拉夫人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性的种族。捷克人提到摩拉維亞王国,塞尔维亚人提到都散王国,都是徒然

---

① “大斯拉夫王国”在巴枯宁原文中也加了着重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注

的。这都是曇花一現的現象或古代的无稽之談。肯定地，沒有一个斯拉夫种族曾經建立过国家。”（第57頁）

波兰君主共和国是当斯拉夫人民（奴隶、农奴、奴仆）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后在日耳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按照波兰許多历史家、例如密茨凱維奇的意見，波兰贵族并非起源于斯拉夫人（第58頁）。

波希米亚（捷克）国家是按照德国的样式、在德国人的公开影响下成立的，因此不久就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俄罗斯帝国：韃靼人的皮鞭、拜占庭的祝福、德国式官僚、军队和警察的教育（第58頁）。

“总之，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来没有自己主动建立过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是征伐的种族。只有好于征伐的各族才建立国家，而且必然利于自己而有害于被征服的人民。斯拉夫人完全是一个从事和平耕种的部族，各自在公社中独立生活，公社按宗法制习惯推选长者管理（管理还有regieren〔統治〕的意思），土地为公社所有，沒有贵族，沒有特別的祭司等級，大家一律平等，‘按宗法形式、即按不完全的形式实现人类友好的思想’。”各公社之間沒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防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沒有任何的斯拉夫国家，但是在十分好客的各个斯拉夫部族之間有公共的、兄弟般的联系（第58、59頁）。“在这种組織下，他們不能抵抗好战部族、特別是力图到处扩大統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与侵略。”（第59頁）“斯拉夫人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則被土耳其人、韃靼人、馬扎尔人、而主要是日耳曼人征服了。”（第59頁）“从十世紀下半叶开始了他們被奴役的痛苦、然而反是英勇的历史。”（第59頁）

“波兰的不幸，它的领导党至今主要是貴族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綱領，它們不从社会革命中求解放和复兴祖国，却

固執古時的偏見，或甘受拿破侖的保護，或和耶穌會教徒及奧地利封建主聯盟，以求解放和復興。”（第61頁）

在本世紀，西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也重新醒覺起來；西部斯拉夫人的中心是波希米亞，南部斯拉夫人的中心是塞爾維亞（第61、62頁）。

國家的最新表現是大日耳曼帝國：“它的末日已近，在它崩潰後，各國人民將獲得徹底的解放……日耳曼人應份受到歐洲其他人民的痛恨，難道值得斯拉夫人羨慕！”（第63頁）。（在這個人物、咖啡館里的政客的眼中，沒有歐洲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頂峯的英國。）

要末沒有任何的斯拉夫國家，要末有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大斯拉夫主義的、聖彼得堡的專制國家（第64、65頁）。

也不能夠把類似合眾國的大斯拉夫聯邦來和大日耳曼中央集權制對立（第66頁）。北美聯邦之所以能夠存在，僅僅因為在美洲大陸上，這一個共和制大國鄰近沒有一個象俄國、德國或法國之類的強國。總之，為了在國家範圍或政治範圍上對抗節節勝利的大日耳曼主義，只有一種法寶——建立大斯拉夫國家。在大俄羅斯暴政下的普羅斯拉夫奴役制（第67頁）。但是這也不可能。歐洲斯拉夫人在數量上幾乎比日耳曼人多三分之一。然而，大斯拉夫國家的實力和真正的國家軍事力量卻從來敵不過大日耳曼帝國。為什麼？“因為在日耳曼血波、日耳曼本能、日耳曼傳統中，有一種國家制度和國家紀律的熱情”；斯拉夫人則相反：“因此，為了使他們遵守紀律，應當用棍棒管束他們，而任何一個日耳曼人都會信服地、自由地接受棍棒。他的自由正在於，他受過嚴格訓練，他熱心地崇拜任何長官。加之，日耳曼人是一個嚴肅而努力的民族；他們有學問、謹慎小心、勤於事務、眼光明確、處世有方，這些都不妨礙他們在需要時候，即在長官希望的時候去出色地戰鬥。他們在最近幾次戰爭中證明了這點。而且他們的軍事和行

政的組織也完善到了极点，为任何别的民族所不及。因此，是否能想象在国家范围方面去和他們竞争呢？”（第68、69頁）。“日耳曼人从国家里面寻找自己的生命与自由：而这对于斯拉夫人則是坟墓。他們在国家之外，即不仅从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从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从社会革命中求解放。”（第69頁）“但国家不会自行崩溃；只有全民、全种族、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倒它。”（第69頁）反对国家的本性迄今以前是他們的弱点，相反地，現在对于目前的人民运动來說則是他們的力量（第69頁）。普通工人群众完全解放，“他們不受任何（指导的）政府的干預，通过自由的經濟的、人民的（dem volk geh örig, öffentlich）联盟（verbindung, Allianz, koalition, Bündnis），打破一切旧的国家界限和民族区别，在人类共同的及形式万千而实质同一的生产劳动的唯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社会組織”的时刻正在接近（第70頁）。

“民族性不是人类共同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的现象，和一切真正的与无害的现象一样，它无疑具有被公认的权利。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小民族都有特殊的性格和风格，这正是民族的实质，即民族的全部生活条件下整个历史生活结果的实质。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是本来如此，而且无疑有权如此。由此就产生所谓的民族权。”（第70頁）

但是由此不应得出結論，这个民族提出自己的民族性，那个民族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們考虑自己越少，贯穿人类共同内容越多；則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具有意义。”（第71頁）同样地，只有当斯拉夫人和别的民族一同貫穿着世界利益时，他們才能爭得自己在历史上和各民族自由友好中的合法地位（第71頁）。

“德国的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日耳曼气质所不具备的暴动性



質，成为和平的国家改革，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系統、有學問的国家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流血的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经过这番斗争之后，它（改革的愿望）被日益胜利的天主教击潰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国，它建立了一种實質上是反对国家的、但又是資產階級經濟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72頁。这一段話極能說明巴枯寧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資本主义国家是反对国家的；第二，德国和荷兰及英国发展中的差別不是从世界貿易的变化等等产生的。）

宗教改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只从宗教的观点来看文艺复兴）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方向：經濟的和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方向（特别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与“實質上同样是資產階級的（他用这个名詞既指資本主义，也指德国中世紀的小市民）和新教的、专制国家的方向，虽然它混杂有貴族天主教的因素，但它完全服从于国家。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先是奥地利德国，然后是普魯士德国）”（第73頁）。

法国革命树立了新的人类共同利益、最完全的人类自由的理想，然而只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无法实现；国家中的自由是謊言。法国革命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剝削，少数人大发横財。在这种剝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个更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专制、即露骨的国家专制（第73頁）。

有一种“直接走向”巴枯寧的新方向反对所有这些意图（第74頁）。

“因此，斯拉夫无产阶级應該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75頁）“我們已經提到維也納工人1868年关于国际友好的庄严声明”（第75頁），它反对大日耳曼主义的綱領。但是奥地利工人沒有采